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晋南北朝

巴蜀书社

译注 许逸民

审阅 安平秋

庾信诗文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庾信诗文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冯 杰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张大川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庾信诗文选译

许逸民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13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1/10/4/15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庾信大抵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如果说人们至今还记得他的话，那并非因为他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或在思想领域有所开拓，而只是因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赏鉴诵读的诗文。这些诗文反映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风貌，同时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曾掀起过一阵波澜。庾信在齐、梁以来的南北朝文坛上，无愧为熠熠闪耀的一颗明星，但在历史的巨人面前排座次，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家。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的近臣，又

是一位享誉江南的诗人。庾信十五岁入东宫，随侍昭明太子萧统为讲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萧统死，萧纲继立为太子，又与徐陵同为东宫抄撰学士。庾肩吾此时也在萧纲宫中，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庾信传》）。这时庾信刚刚十九岁，可谓少年得志。二十岁以后，历安南府行参军，转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三十岁时，出为郢州（今湖北武汉）别驾，在任期间曾与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讨论水战平乱之事。大同十一年（544），三十三岁，以通骑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所称”（同上）。返国后，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今江苏南京）令。一说为正员郎，又为东宫领直，节度宫中兵马。（宇文道《庾信集序》，以下简称字序）以上是庾信的青年时期，就梁朝而言，正值“五十年间，江表无事”、“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哀江南赋》）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则是职兼文武，青云直上，踌躇满志，挥斥方遒之时。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庾信三十六岁，遭逢侯景之乱。当侯景兵临城下时，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驻守朱雀航（即朱雀桥，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结果乱兵刚一冲击，信便弃军

败走。侯景陷台城，信沿长江西上奔江陵（今属湖北）。在战乱中，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宝二年（551），历尽风险而抵达江陵，任御史中丞。承圣元年（552），梁元帝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承圣三年四月，加散骑常侍，奉命出使西魏。这一年的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自西魏出兵之日起，信即作为人质被扣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年四十二岁，从此以后再也未能回归南朝故土。侯景之乱以来，不过短短六、七年，庾信却接连遭受到家破国亡的打击，成为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期。

江陵倾覆后，西魏开始笼络庾信。初授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继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两年之内，其位望已高于梁时。周代西魏之初，庾信似有一段赋闲退居的日子，也因此而产生过田园终老的念头，但很快又被起用为司水下大夫，并预麟趾殿校书，退隐之意也逐渐泯灭。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他首次离开长安出任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县北）守。大概过了一年多，复回长安任职。天保六年（571），随北周齐王宇文宪伐齐。又过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建德四年（575），六十三岁，周、陈南北通好，陈宣帝要求让庾信、王

褒等回南，周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褒则惜而不遣。翌年，出为洛州（今陕西商县）刺史。大象元年（579），入为司宗中大夫，不久因疾去职。隋开皇元年（581）下半年，卒于长安，享年六十九岁。庾信在花甲之年失去了最后一次南旋故土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终生的遗憾。

庾信生于南方而死于北方，身历四朝（梁、魏、周、隋）十帝，其阅历与感受乃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与此相关联，他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爱好，则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嬗变。关于他的文化素养，我们可以举出这样明显的几点：（1）精通儒学。字序说他“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可见他受到儒家忠孝、礼义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因而比较注重出处大节；（2）长于史学。《周书》本传称：“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我们看他的诗文用典，动辄《左传》、《史》、《汉》，间杂晋、宋史事，说他长于史学似非虚誉。又《左传》定公十年载：鲁、齐两国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东南），齐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指责说：“裔（边远的）不谋夏（中原），夷（东夷）不乱华。”这件事表明《左传》一书中有着“夷夏

之辨”的思想，这种思想打在庾信身上的烙印，从他在北方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3）文重绮艳。庾信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因为文并绮艳，世号“徐、庾体”。庾信对此点没有进行过直接的表述，但其创作倾向已足以说明一切。其实当齐、梁之世，骈体文学发展到极致，文学批评家如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无不视辞藻华美、声调对切的作品为文学正宗，又何止庾信一人如此。“绮艳”、“清新”应该说是齐、梁以来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

关于庾信的性格，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两方面的记载给人印象很深，一是说他娴于辞令，文思敏捷，一是说他恃才傲物，争强好胜。前者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有数条专记庾信在外交场合的应对，真正是有礼有节，妙语连珠。难怪他不论在梁朝，还是在北朝，都是外交场上的活跃人物。后者如当年西奔江陵途中逗留江夏（今湖北武汉），遇早年好友萧韶，当时韶为郢州刺史，骄傲居大，接待十分冷淡，庾信不堪忍受，使酒骂座，践踏肴饌，在众宾客面前使萧韶大感惭耻。（见《南史·梁宗室传》）又如有人问庾信北方文士如何，他答道：“唯有韩陵山一片石（指温子升《韩陵山寺碑》）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

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金载》卷六）这种横扫一切的架式固然来自南人看不起北人的传统恶习，但也和庾信恃才傲物的性格大有关系。

在了解了庾信的生平经历、文化素养与性格特点之后，再来看他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就比较清晰了。庾信在南朝的诗文留存不多，仅就《春赋》、《镜赋》、《奉和泛江》、《奉和山池》、《和咏舞》等篇来看，无非咏物写景之作，所见者既小，格调亦不免卑弱。论其思想内容，则流连歌舞，冶荡声色，庸俗低下，甚至流于色情，这些自然无可称道。然而论其形式与技巧，则争驰新巧，颇变旧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对于南齐“永明”文学又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其中某些接近于唐人律诗、绝句的诗篇，在诗歌史的发展中则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至于庾信这种伤于轻艳的南朝旧作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也是个不可轻视和忽略的问题。《周书·庾信传》说：“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陈书·徐陵传》说：“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思。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这说明“徐、庾体”赢得了当时文坛的公认，并影响到了人们创作观念的改变。

庾信的后期诗文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他由南入北以后，诗文多写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风格则变轻艳为苍凉，因而后期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胜过前期。这种说法在整体上说来、在思想意义上说来是不错的，但若评论诗文的艺术风格，以为诗与文二者并皆后胜于前则显然不切于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钦佩钱钟书先生的卓见，他在《谈艺录》中说：“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縠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至其诗歌，则入北以来，未有新声，反失故步，大致仍归于早岁之风华靡丽，与词赋之后胜于前者，为事不同。”

（第300页）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庾信在艺术上的追求和贡献，评价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截然以南北划分界线而判其优劣的。

上文我们已谈到了庾信的诗文独步江南的情

况，那么他在北方文坛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有如下的描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周明帝宇文毓）雅词云委，滕（宇文逌）、赵（宇文招）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王褒庾信传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大将军，德棻之生距庾信之死仅差两年，所说应属可信。既然北周朝野宗仰王、庾如嵩岱、溟渤，则表明当地文风也处在王、庾的领导之下，在当时的一场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南方文风的影响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种情势下，庾信赋风之变及诗风仍沿南朝餘绪，二者皆不足为怪。

要完全了解一个人，还离不开对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分析。庾信在北朝的生活情景，概括起来就是《周书》本传中的两句话：“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所谓“位望通显”，指北周统治者给予他的礼遇很高，他在北周又有着显赫的声名。这两点在前面介绍生平仕履与北周文坛情况时已经说到过，除此之外，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如奉答赵王诸诗以及滕王为作集序之类，都可说明他在北方与昔日在南方一样过着怡荡

富贵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他有安之若素的一面，甚至对北周王室充满了感戴之情。如《咏雁》诗：“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门关。稻粱俱可恋，飞去复飞还。”诗中流露的贪恋心理是不言而喻的。又如《谢滕王集序启》：“溟池九万里，无逾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他在北方的这种心态，归结为受宠若惊并不为过。在受宠之余，他何以又“常有乡关之思”呢？粗略说来，这种“乡关之思”的思想根源出自三个方面：（1）中原汉民族意识。例如，《拟咏怀》之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连珠》之二十三：“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这里的“汉”、“胡”之分，“非类”之说，以及“恨心”所在，“怨”、“哀”所生，即是庾信汉民族意识的流露。在当时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庾信的内心痛苦实际上也浸染着历史的血泪。（2）南朝世族的门阀观念。从《哀江南赋》中缕述家族历史，强调“以世功而为族”，“用论道而当官”，“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可看出庾信的门阀观念十分强烈。因而一旦家国俱